

# 杜公祠

## ◎ 国宝档案

“南渡春流浅,西风片雨晴”。这是唐人韩翃描写樊川的诗句,浅浅蜿蜒的水流,时断时续的细雨,简直美得不可方物。此地两原相峙,背靠少陵,南望神禾,东是杜曲,西是韦曲。周为樊邑,汉为樊哙的封地,唐时韦杜两大家族在此聚居。曲的原意是蜿蜒的溪水,水润樊川,便有了十里桃花百亩稻田,有了梵音袅袅八大古寺,这一片山水林泽就成了盛唐的遗韵。

余光中说,李白酒入豪肠,三分啸成了剑气,七分酿成了月光,秀口一张便是半个盛唐。在笔者看来,樊川这一片山水田园,却属于另一个诗人,那就是杜甫。杜甫在长安十年,其中有两年住在少陵原畔的牛头寺旁,他在长安朝扣暮随的清苦生活,却展现了盛唐的另一幅景象。

### 宁静中印证着孤寂与无奈

有人考证,杜甫的远祖是晋代杜预,祖籍也在樊川。他的祖父杜审言在洛阳一带做官,杜甫出生在巩县,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河南。壮年之后,他来到长安,求取功名,想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却屡屡碰壁,过着“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的生活。凝视他走过的孑孓身影,长安十年,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光。也许是后人为了从感情上弥

补,千年之后,在少陵原畔建了一座祠堂,让他享受香火的供奉。

杜甫的祠堂不大,青砖灰瓦,掩映在青松翠柏之间,与成都的草堂有天渊之别。成都的草堂规模宏大,终日人声喧哗,这里宁静而少有人来,恰恰也印证了诗人困顿长安的孤寂与无奈。

杜公祠依少陵原而建,北依少陵原,南望神禾原,西接千年古刹牛头寺,下坪是一座将军的陵园。拾阶而上,走过一个小小的山门,便是一个寂静的小院。正面坐北朝南有享殿三间,正中有杜甫的塑像一尊,神态肃穆、郁郁端庄。塑像东侧是“唐杜文贞公遗像”碑,碑上有诗人着朝服的半身石刻像。享殿西碑房墙上嵌着古碑六通,除《守护法藏诫文》碑外,其余皆是明清两代修祠的记事碑。山门两侧建有碑廊,是历代书家书写杜诗的碑林,曲曲折折、蔚为壮观。东西的展室展现了杜甫的生平,特别是在长安十年的经历,观看之后,让人思绪万千。

“美花多映竹,好鸟不归山”,这是他初来长安,赞美韦杜地区的诗句,然而这时却有山不能归,有家不能回。兵荒马乱,他只能四处漂泊,从奉先县到鄜州、到灵武、到凤翔……

###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

杜甫初到长安是天宝五年(公元746年),是唐明



皇纳寿王妃的第二年,权臣李林甫红极一时的时候。杜甫时年三十五岁,正当盛年。他雄心满满,从中州大地走来,从齐鲁孔孟之乡走来,从吴越会稽走来,从江淮太湖走来,壮游了四方,觉得已有足够的才华,然后来到喧嚣的都城,追宗思源,祭拜远祖,求取功名,以实现经国济世、安邦定国的宏伟理想。

“赋料扬雄敌,诗看子建亲”。杜甫对自己相当自信,认为他的才华与汉朝扬子云(扬雄,字子云)、三国曹子建不相上下,而且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简直是天下奇才,比他的偶像李白刚进长安时还要自负。然而,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在李林甫“野无遗贤”的禀奏下,他科举考试又一次名落孙山。这让他乱了阵脚,以致穷困潦倒,到了三餐不保的地步。“饥卧动即向一旬,敝裘何啻联百结”,在穷困和失意的双重煎熬下,一个爬树健如牛的青年,被现实折磨成了

小老头。被逼无奈,一向铁骨铮铮的他不得不违心地求助权贵举荐,说一些肉麻的话,写一些肉麻的诗,还给唐明皇上了一篇拍马屁的《三大礼赋》。但,除了得到一个“端正贤良”的赞誉外,杜甫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,四年后才被授予一个管理兵械库的甲胄参军小官,这和他的理想和抱负相差甚远!不久,他便去职回家了。

“野无遗贤”——上升的通道已经被堵死,杜甫在长安毫无希望。在友人的帮助下,穷困的杜甫住到了少陵原畔牛头寺东跨院,自号“杜陵野老”,过起了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的生活。但看人脸色的日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,生活仍不安稳,因此杜甫把妻儿老小安顿到了奉先县,过着靠亲友接济的生活。杜甫自己仍然生活在长安等待机会……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在他回到奉先县得知自己小儿子饿死时,他非常痛苦,作为一个父亲,他觉得自

己太失败,但也毫无办法。“长安苦寒谁独悲,杜陵野老骨欲折”。这还是人过的生活吗?

### 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长安

“穷年忧黎元,叹息肠内热”。他心太热,因而命也就太苦。他时时都抱着入仕的希望,想为民请命,振兴国家,但每一次都令他失望。他向往着燕昭王的黄金台,招贤任能,一血国耻,但只能是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泣下”。

当听到太子在灵武登基的消息,他觉得机会来了,远走灵武,可半途被贼兵所执,抓回了长安。杜甫虽被困在长安,但心系朝廷,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战事的变化,在此期间他写了两篇文章: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》和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》,为剿灭叛军献策,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当听说郭子仪大败叛军,肃宗朝廷迁到了凤翔府。于是,杜甫在一个和尚的帮助下,冒险从长安金光门逃出,穿过两军对峙之处,到凤翔见到了日夜想念的皇上。然而,刚登帝位的皇上却不怎么待见他,看他衣衫褴褛、忠心犹在,便授予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。左拾遗属于谏官,虽然只是从八品,官不大,但说话还有一定的分量。杜甫心太直,因而命运多舛,他确实不是官场中人,没过几天就卷入宰相房琯案中。房琯率军抗击叛军,

大败而回,被贬去了相位,当满朝文武无人为房琯说话时,只有杜甫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为房琯辩护,最终惹恼了肃宗,要将他下狱治罪。好在有宰相张镐等人的搭救,杜甫才被无罪释放。但经此一遭,他也失去了皇帝的信任,被罢官回家。

杜甫是历史的失落者,他的诗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晚唐才被重视。但诗只是一种文化现象,关于他的人,说的却不多。他的祠更晚一些,明嘉靖五年(公元1526年),长安人张治道经过考证认为杜甫的生里、流寓、宦乡都在长安,于是倡导修建了少陵原畔的杜公祠。但说起生里,长安只是远祖之籍;宦乡,只是个两天半的小官,却烦劳了诗人一生;最后只剩下流寓,流得万分凄苦,一生惆怅。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,杜甫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长安,困守长安近十年,他期待过,努力过,挣扎过,甚至拉下脸皮,给人溜须拍马,希望能对朝廷有所贡献,最后却一事无成。之后四年便是安史之乱,他逃亡、被抓,短暂为官,在仕途和正义之间他选择了犯颜直谏,结果失去了政治前途。身未老,鬓已斑,他满怀希望而来,最后带着失望而去。

乾元二年,公元759年,杜甫丢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,前往秦州。之后漂泊西南,再也没有回来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# 名字起得好 名次能提高

隋文帝开创科举制度后,科考取士逐渐成了历朝历代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。然而,谁能想到,士子中与不中、名次的先后,并不全凭学业成绩,考生的姓名有时也会起作用。

唐佚名《玉泉子》载:会昌三年(843年),王起任主考官,考试结束后,他请示宰相、《次柳氏旧闻》作者李德裕,李德裕说,我没有什么要求,“如卢肇、丁棱、姚鹄。岂可不与及第邪?”结果,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就按李德裕所

点三人顺序出炉。李德裕实在牛,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一起搞掂。

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八载:江东有个名叫包谊的士子,得罪了中书舍人刘太真,便被这个专门给皇帝起草文件的人牢牢“惦记”。“……明年太真主文,志在致其永弃,故落杂文……”此科放榜前,主考官刘太真照例带着录取名单呈送宰相审定,“宰相以朱毗近大逆,未欲以此姓及第,亟遣易之。”刘太真惊愕万分,又不记得其他

考生姓名,“唯记谊尔”。包谊谢恩时,刘太真告诉他实情。可见,刘太真气量虽小,人还实诚。

而颜标中状元完全沾了姓的光。《唐摭言》卷八载,公元854年,礼部侍郎郑熏任主考官,徐州叛军作乱未平息,郑侍郎想借科举灌输忠君爱国思想,正巧有个叫颜标的同学也在考试,而郑侍郎恰是颜真卿的铁杆粉丝,以为颜标是颜真卿的孙子,就把状元赏给了他。颜标谢恩时,郑侍郎问了他家祠堂

后,才知眼前的状元乃寒门出身。

自唐至清,因姓名关系被天上掉下来的“馅饼”砸中的考生层出不穷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,经袁世凯等人奏请,清廷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。这一年,将补行辛丑(1901年)万寿恩科和壬寅(1902年)正科会试合并举行。刚好,这年也有乡试,次年就是慈禧的七十大寿,主持乡、会、殿试的官员,都非常留意“吉庆之兆”。

头两批放到云贵两广主考官的名字分别是:李哲明、刘彭年、张星吉、吴庆坻、达寿、景方昶、钱能训、骆成骧,连缀起来,就成了“明年吉庆,寿景能成”。这年殿试,必须取一个名字中有“寿”的士子,以示预祝,于是山东人王寿彭的名字很幸运地做了金殿传胪第一声。

古代科考有颜标、王寿彭等因姓名走“狗屎运”的,就有因名大受其害的“倒霉蛋”。顺治十二年(1655年)科考,初定太仓

人王揆为状元,可唱名时,顺治帝因读音相同想起《王魁负桂英》这个流传极广的剧本。剧中的王魁是个负心汉,中状元后抛弃糟糠妻。顺治帝脱口说:“是负心的王魁耶?”皇帝金口玉言,王揆的状元立马换成他人。同治七年(1868年)科考,拟定江苏人王国钧为一甲,可把“王国钧”连起来读,就是“亡国君”的谐音。慈禧太后听到这个名字,非常生气,结果王国钧就被拿掉了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